

孟克双鼎合璧重聚

——国博、上博联袂呈现大孟鼎、大克鼎

本报记者 付裕

6月10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大孟鼎启程运往上海博物馆。6月18日，“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获赠青铜器特展”中，大孟鼎、大克鼎将重聚，并与其他19件青铜鼎一起展出。在为期一个月的展期之后，“孟克双鼎”将共同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共襄盛举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获赠青铜器特展”将于6月18日开幕，预计展期1个月。将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的有铭青铜鼎21件，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成军表示，此次国博上博互借大孟鼎、大克鼎，并以两件国之重器为核心策划主题展览，是博物馆人奉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华诞的一份深情礼赞。

大孟鼎、大克鼎与毛公鼎合称清末时期的“海内三宝”，是迄今为止有铭青铜鼎中最大的两件，于19世纪先后出土于陕西眉县、扶风地区，后为潘家珍藏，历经战乱，世代守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于女士代表家族将此双鼎无偿捐献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大孟鼎应征北上，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坚介绍说，“大孟鼎、大克鼎的故事堪称中国文物天地最壮美、最瑰丽的诗篇之一，从文物的前世今生来看，它们的前世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那种灿烂辉煌，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在青铜艺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从晚清以来，收藏家的藏宝和护宝行为中，也表现了收藏家发自内心的、最真挚的爱国情怀，还有对文化传承的热忱和力量。”

为配合双鼎互展，上海博物馆将于2021年7月中旬在上海举办中国古代青铜器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数十位国内学者围绕商周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展开研讨。

大孟鼎与大克鼎

大孟鼎铸造于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是迄今所见西周时期铭文较多、体量最大的青铜器之一，也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厚重雄伟，磅礴大气，为国家一级文物。

大孟鼎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器壁较厚，两只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宽，大



大孟鼎（国家博物馆供图 摄影：陈拓）



大孟鼎 铭文（国家博物馆供图 摄影：陈拓）

壁斜外张，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有浮雕式饕餮纹。

大孟鼎器腹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记录了周康王在宗周对孟的一次册命，大致内容是：康王追述了文王受天命和武王建邦的历史，指出纵酒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勉励孟效法其祖南公，恪尽职守，夙夜在公；赏赐孟鬯酒、舆服和南公之旅，以及奴仆1700余人；孟感念王之册命，为祭祀南公而作宝鼎。这篇铭文是目前所见西周时期较早的“册命”类出土文献，是研究周初“封建”制度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早期作品，其布局优美，书风瑰丽，是西周金文的杰出代表。

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在《大孟鼎的收藏者潘祖荫写信时曾激动地说：“（大孟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成康以后之人，恐即不得见，况秦汉乎，况宋之后乎！今人何如是之幸，斯器又为何而出，殆天之为矣！”

著名学者陈梦家曾高度评价大孟鼎说：

“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为第一瑰宝。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但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铭文和体量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器形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瀾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质朴简洁，有别于商代晚期以来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大克鼎鼎腹内壁铸有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师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



大克鼎（上海博物馆供图）



大克鼎 铭文（上海博物馆供图）

法门寺任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钟、镈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大鼎被称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

潘氏后人为了保护双鼎等珍宝尽全力，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双鼎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始终没有找到。

1951年，潘达于女士致信国家称：“窃念孟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毅然将大孟鼎、大克鼎无偿捐献给国家，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成为上海博物馆最重要的“镇馆之宝”。1959年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时，大孟鼎应征北上。从此，双鼎分镇京沪。

2004年大孟鼎曾赴上海与大克鼎聚首，在“人寿鼎盛——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孟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中展出，庆贺潘达于女士百岁寿辰。

宋八出葵花形荷叶纹镜

李莹清



宋八出葵花形荷叶纹镜，直径七厘米，武汉博物馆藏。

宋八出葵花形荷叶纹镜，直径7厘米，武汉博物馆藏。形制为八出葵花，钮座为萼片形。镜面平坦素雅，光洁照人。整个镜背看上去就像一片张开的青绿荷叶，主题纹饰为荷叶叶脉，以钮座为中心弯曲展开，在自然延伸的过程中，又生出一些枝纹，宛若老树新枝，纹理清晰，叶脉分明，每条叶脉均与镜之葵花边缘相连。

古人以铜镜照容，无论在镜背上刻画什么，都表达了他们对它的一种感情：热爱、希望、追求、吉祥等。古时，有友人以互赠荷叶寄托思念之情，叶脉紧凑又代表着和睦团结，荷叶还有着清廉纯净及儿孙满堂开枝散叶的吉祥寓意，在佛教中还象征着吉祥与好运，所以荷叶成为古代画家笔下常见的题材，荷叶纹饰在古代铜镜、陶器等等器具上频频出现。荷叶表面附有无数个微米级的蜡质乳突结构，使荷叶表面与水珠的接触面积极其有限，导致水珠在叶面上滚动的现象。在这面铜镜纹饰的处理上，匠师充分利用了这一原理，

在叶脉纹之间散布着一些水珠纹，充满动感，令人联想到宋代词人李重元笔下“风蒲猎猎小池塘，过雨荷花满院香”的雨后荷塘场景。

在玻璃镜出现之前，铜镜一直是古人照面饰容的重要生活用具，北宋时代的《宣和博古图录》中就已见著录，流传至今的古代铜镜，无不铸制精良，形态美观，镜背图纹华丽，艺术性与实用性兼具，都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宋代铜镜虽然没有盛唐铜镜那么繁盛，但在承袭唐镜艺术的同时，亦有自己面目。这面宋代八出葵花形荷叶纹镜应该是北宋初期模仿唐镜形制铸制，保留了唐末五代铜镜镜体厚、线条粗、纹饰粗犷、偏重实用而轻图纹的特点，构图简练，线条流畅，主要突出荷叶脉络，采用细致入微的细线浅浮雕手法，使荷叶茎脉纹理显得粗犷厚重，宛若分叉的枝条，自然盘绕，形成纤巧秀丽的荷叶图案，画面细腻，描绘逼真，写实性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体现了宋代制镜匠师卓越精湛的技艺水平。

百部原拓《建党百年印谱》在沪首发

本报讯（记者 顾意亮）6月3日，“辉煌百年——百部原拓《建党百年印谱》首发仪式”在上海市静安区文化馆举行。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由民革成员发起创建的上海博爱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邀请国内著名篆刻家，精心创作了100方党史主题印章；并邀请国家级非遗鲁庵印泥制作技艺和海派传拓技艺双料代表性传承人符海贤及弟子田非凡，精心钤拓100套印谱，以此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100方小小的印章，在方寸之间，讲述了一部恢宏的奋斗史。印章内容源自百年党史中提炼出的关键词，如“开天辟地”“不忘初心”“百年辉煌”“百年圆梦”等。这些词句记录了中

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直至如今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奔向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光辉历程和坚定信仰。10000张印谱纸，15个月的手工钤拓，代表着艺术家们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拳拳之心。

《建党百年印谱》的筹备历时一年多。该印谱为一函二册，融合了篆刻、宣纸微墨、连史纸、一得阁墨汁、雕版印刷、古籍装帧、鲁庵印泥、海派传拓等多项非遗项目，弥足珍贵。目前，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及江浙沪部分重要博物馆都已经明确接受该印谱的捐赠。上海博爱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还将在沪举办巡展系列活动，通过这100部印谱，让更多的人更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历史，唱响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主旋律”。

宁夏红寺堡文化艺术周推出书法教师优秀作品展

本报讯（记者 付裕）“共产党好 黄河水甜——红寺堡文化艺术周暨‘知行合一’书法教师优秀作品展”日前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协办，陶行知教育基金会承办，旨在通过书法名家邀请展、专题讲座、书法创作交流、书法教师优秀作品展和书法教育扶持计划等一系列活动，增加青少年对书法的兴趣，提升书法教育水平。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苏士澍表示，红寺堡区作为全国最大的易地搬迁生态移民区，不仅在脱贫攻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文化建设方面，也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在学校建设上有长远规划。特别是在书法教育方面，红寺堡区有着比较好的硬件基础优势。希望通过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及中国书画家协会的协助，从教师培养入手，为当地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师资力量，带出一批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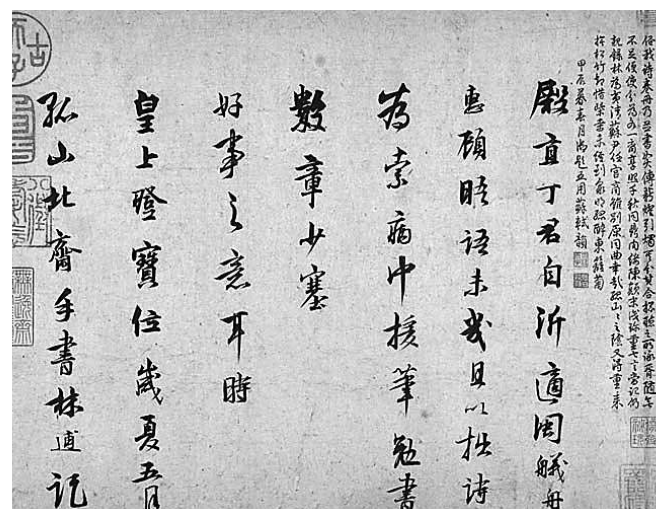
有一定创作水平的学生，全面提升学生的书写能力和对传统文化热爱。

在启动仪式上，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陶行知教育基金会书画教育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周志高介绍基金会支持红寺堡区青少年书法教育的扶持计划，还为共建的陶行知公益书法教室进行揭牌。此前，双方合作的“知行合一”书法教师优秀作品展已经正式开始网络征稿，并将于7月底揭晓入选结果并对入选书法教师启动扶持计划。

与此同时，艺术家们还就当地青少年书法教育目前存在的困难以及相关解决方案进行了研讨，对加强青少年书法教育的创新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通过对相关政策的细致解读，分析了各方的资源优势，确定了通过陶行知教育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和专业机构的合作，引入专业的社会力量，从解决当地的书法教师资源入手，突破目前存在的瓶颈，推动当地青少年书法教育的发展。



宋代林逋行书自书诗卷



《宋代林逋行书自书诗卷》局部，宋，林逋书，纸本，手卷，纵32厘米，横302.6厘米。行书34行，6段接纸。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林逋行书自书诗卷》共计5首诗，除第2首为五言诗外，其余均为七言诗。应为宋代时期书法家林逋归隐西湖孤山时所书。林逋书体瘦劲秀逸、风姿绰约。写就此书时，林逋时年57岁，书法精致、风骨俊美。

书，是罕见的苏轼传世佳作之一。

后纸有乾隆皇帝用苏轼原韵五题御制诗记二则（其中一则由董诰奉敕而书），又有明王世贞、王世懋，清王鸿绪三家题跋。

宋内府《宣和书谱》，明汪珂玉《珊瑚网》、詹景凤《东图玄览》，清顾复《平生壮观》、吴其贞《书画记》、安岐《墨缘汇观·续编》、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高士奇《江村消夏录》、吴升《大观录》、阮元《石渠随笔》、内府《石渠宝笈·续编》等书有著录。